

海权发展的历史动力及其对大国兴衰的影响^{*}

刘中民

【摘要】近代东西方国家面对海洋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命运。对此西方学术界多从文化传统、经济动机、政治制度等角度加以解释。对于海权发展的根本动力,本文认为,世界海权兴衰的历史表明,资本扩张能力既是海权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海权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对于如何科学看待海权与大国崛起的关系,本文认为,海权本身并不具有确保国家强盛的神奇功效,国家盛衰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活力以及制度创新的能力。

【关键词】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 海权 历史动力 大国崛起

海权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历史机遇在于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地理大发现,不同国家面对海洋的不同选择尤其是东西方国家对历史机遇的不同把握,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命运。很显然,欧洲国家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完成了国家的崛起,而东方国家尤其是创造了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奇迹的中国,却与近代世界权势变革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对于西方海权国家的崛起,英国著名军事学家富勒曾经指出:“自从发现了新世界和绕过好望角以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之后,欧洲的商业中心逐渐西移,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趋向大西洋沿岸。如此,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以及后来的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和法兰西,为了世界贸易和新发现的地区的主权,都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劲敌。自此,一直到最近,帝国主义的发展都是趋于海外的殖民主义,而帝国也趋于海洋化形式。”^[1]对于中国的命运,也有学者评价说:15世纪的“中国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国。但中国没有”^[2]。以上两种

作者简介: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 基金项目:2006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成果;200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世界海洋政治的发展与中国海洋战略选择”(04JJDZH017)阶段性成果。

[1] [英]J. F. C. 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2卷),钮先铭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 [美]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当中国称霸海上》,邱仲麟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评价基本上反映了西方与中国面对海洋发展机遇的不同选择所导致的不同历史命运。对此,国际学术界对东西方海权发展不同历史命运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本文试图在对学界观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海权发展的历史动力,并以此为视角说明如何科学看待海权对大国崛起的影响。

一、学术界对东西方海权发展不同历史命运的解读

东西方之所以面对海洋做出不同的选择,表层的原因在于对机遇的认识和把握,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向海洋发展的动力、动机如何。对于西方而言,“在11世纪至15世纪的500年中,欧洲有了某些使它要求并能够向海外扩张的发展”。“向海外的大规模扩张就是西欧所具有的新动力的一个表现。”它使西欧人控制了外洋航线,能够抵达、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人迹稀少的广阔地区,并移居那里;从而改变了世界各种族传统的地区分布。最后通过扩张,西欧财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强,到19世纪时,已能深入并控制位于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3]综合中外学界的分析,东西方向海洋发展的动力、动机的不同主要体现在:

首先,西方具有基督教普世主义的扩张精神传统,而东方有着“不好战、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传统。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利亚诺斯认为,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找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4]不管这种因素是否处于主导地位,但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早期欧洲海权之所以在地处欧亚大陆一隅的伊比利亚半岛兴起,征服伊斯兰教异教徒确实构成了其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动机。相反,作为东方文化中心的中国,则完全没有扩张的精神动力。西方传教士利马窦曾经指出:“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5]有学者在对欧洲与中国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从各方面说,中国15世纪的失败更多地是由于动机而不是手段的相对缺乏。”^[6]

其次,不同的经济发展动力。中世纪晚期,欧洲人口的增长、城市国家之间竞争压力的增长、内外贸易的发展都“驱使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路线和新的市场”。^[7]这一点在葡萄牙的率先兴起中仍然能够得到解释。西方首先进行海权扩张的主角并非欧洲大国,而

[3] [美]斯塔夫利亚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页。

[4] 同[3],第12~13页。

[5] 同[3],第12~13页。

[6]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卷),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7] [美]斯塔夫利亚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是偏处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西班牙,这一直是人们颇感困惑的一个谜团,因为“很少有人想到葡萄牙会担当这个角色的候选人”^[8]。世界体系论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从经济的角度看,葡萄牙商业经济发达、资本充裕,且“有从事远距离贸易的丰富经验”;同时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助长了葡萄牙的冒险精神”。因此,“它的地理历史逻辑支配它把向大西洋扩张作为国家最合理的商业冒险”^[9]。对此,恩格斯解释说:“在十五世纪末,货币已经把封建制度破坏和从内部侵蚀到何等程度,从西欧在这一时期被黄金热所迷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10]然而,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中国不断通过“在东南部地区发展稻米生产谋求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农业基地”,而进行“内部扩张”,^[11]进而使其缺乏进行外部扩张的动力,同时也使更多的人力限制于农业生产之内;另一方面,中国缺乏进行国际贸易的动力与动机,“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哩,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贸易毫无兴趣,只是将诸如长颈鹿一类的奇珍异兽带回自给自足的祖国,以取悦他们的皇帝”^[12]。

第三,君主制帝国与“民族君主国”的差异。15~16世纪,欧洲已经出现了“民族君主国”,确立了王权控制下的国家主权,率先进行海权扩张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都是最早建立的“民族君主国”,而他们之间的权势竞争促使其向海外扩张并展开争夺。“欧洲没有一个国王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民族君主国展开了狂热的竞争。”与此相反,“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动力和社会地位,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皇帝的敕令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13]。“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到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中止。……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阻止他们这样做。”^[14]

对于葡萄牙海外扩张的原因,历史学家J. H. 萨拉伊瓦作了如下精辟的分析,其中似乎包含了上述所有的主要因素:

15世纪初,国内条件为扩张创造了大好时机,虽然葡萄牙社会充满着矛盾,但是扩张符合各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对于人民来说,扩张主要是一种移民形式。对他们来说扩张同移民意义相同:追求较好的生活条件和摆脱压迫制度。

……

[8] 同[7],第30页。

[9] 同[7],第36~38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1卷,第450页。

[11]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卷),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页。

[12] [美]斯塔夫利亚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13] 同[12],第474页。

[14] 同[12],第32页。

对于商人来说,扩张意味着生意前景兴隆,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产地购买原料和高价转卖。

对于国王来说,扩张是提高威望的机会,使贵族们有事可干,更重要的是可以开辟新的财源,特别是在国王收入大幅度下降的时刻。……

因此,扩张是解决国家集体生活的主要矛盾的一种办法。……随着新领土的发现,葡萄牙开始消费葡萄牙领土之外的生产资料,或者说消费通过这些生产资料得到的财富。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的航海事业开始之后国内战争时期便告结束。从那时候开始,扩张成了一项全国的大事,每个人都想从扩张中得到好处,这也是为什么葡萄牙的海外扩张政策对葡萄牙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以及为什么在一个各项工程计划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烟云过眼,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代人的国家中,唯独扩张成了一种持久的活动,并通过历史条件所允许的各种形式,列入国家计划达五百年之久。^[15]

美国学者斯塔夫利亚诺斯如下的一连串发问则更加深刻地说明了明代中国与西方对于海洋的不同认识和不同选择:“明朝的这些远航,为何是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业方面的原因而进行的;为何是由宫廷太监而不是合股公司组织和领导;为何返航时带回的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而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生产商业利润的货物;为何接到中国皇帝的命令便会完全地、无可挽回地停止。那时的西欧是无可匹敌的,它拥有向外猛冲的推动力——宗教动力、思想骚动、经济活力和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的民族君主国。”^[16]

二、资本扩张:世界海权发展最根本的动力

上述种种解释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借鉴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世界海权兴衰的历史表明,资本扩张能力既是海权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决定海权能否长久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

葡萄牙、西班牙海权迅速崛起和衰落的历史便证明了这一点。葡萄牙、西班牙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大发横财,但是,由于本国工业不发达,封建势力强大,这些财富被封建主浪费殆尽,并未转化为资本,而是转手都流入工业发达的英国、荷兰等国,在那里加速了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但是,“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17]。在沃勒斯坦看来,“西班牙的衰败是近代欧洲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课题”。西班牙在收复失地基础上建立的封建制度的软弱、

[15] [葡萄牙]J·H·萨拉伊瓦:《葡萄牙简史》,李均报等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124页。

[16] [美]斯塔夫利亚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5页。

税收基础的薄弱、对殖民地控制能力的低下、充当反对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新教的反对者的首领、充当反对伊斯兰教的首领等因素都构成了西班牙霸权衰落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因素在于,“西班牙衰落的原因似乎是没有建立(也许因为它不能建立)能使西班牙统治阶级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创立中获利的那种国家机器,尽管16世纪西班牙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居于中心的地理经济位置”,“一旦在1588年无敌舰队战败,它的这种国际地位就循着国际政策的内在逻辑结论走下去。”^[18]

作为葡萄牙、西班牙继任者的荷兰海权的兴衰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荷兰摆脱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后,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其特点是以商业资本为主。事实上,早在尼德兰革命之前,“荷兰人在波罗的海的贸易中一直发挥日益增长的作用。他们在中世纪晚期站稳脚跟,到16世纪初逐渐取代汉萨同盟诸城市。他们的整个波罗的海的贸易在16世纪走了一个上升曲线,1560年左右达到最高点,当时70%的贸易为他们所控制。尽管尼德兰革命时期多少干扰了波罗的海的贸易水平,荷兰人到1630年就弥补了他们暂时的下降。”一旦尼德兰内部的政治斗争趋于稳定,荷兰人就不再仅仅是波罗的海的贸易中心,而一跃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尤其是伴随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的转移,阿姆斯特丹作为连接欧洲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东欧和西欧的纽带,已经“变成欧洲经济的三重中心:商品生产、转运中心和资本市场”^[19]。在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商业和国际贸易占有十分突出的优势,这种情况决定了荷兰海上力量的发展,使它可能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成为17世纪的海上霸主。英国著名的海洋军事专家安德鲁·兰伯特指出:“他们拥有强大的海上经济实力,又有和西班牙长期作战的经验,其海军实力非同寻常。荷兰共和国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北海渔业以及波罗的海的贸易,它还从地中海、西印度群岛和东印度群岛等长期贩运中获得巨额商业利润。”^[20]

此外,荷兰的造船业是最发达的工业部门之一。在造船业兴盛的时期,荷兰同时开工造船达几百艘,仅阿姆斯特丹一处就有几十家造船厂。到17世纪中期,荷兰已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商船队,其船舶总吨数相当于当时英、法、葡、西四国的总和。航海业的发展,保证了荷兰对外贸易的优势。当时成千上万的荷兰商船航行在世界的海洋上,他们经营外国商品,充当各地贸易的中介人和承担商品的转运业务,被称为“全世界的海上马车夫”。从事这种转口贸易,使荷兰取得了海上贸易的霸权。当时欧洲南方和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欧洲与东方之间的贸易几乎全部都掌握在荷兰人的手中。由于欧洲国家市场价格相差很大,这种转口贸易带来了巨额利润,荷兰资本主义的繁荣就是建立在这种商业垄断权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指出:“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21]

但是,17世纪50~70年代的三次英荷战争使荷兰的军事和商业威力遭到了严重的削

[18]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卷),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232页。

[19] 同[18],第243页。

[20] [英]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郑振清、向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8页。

弱,荷兰从此一蹶不振。70年代以后,荷兰与法国、英国进行许多次战争,在这一系列战争中,荷兰进一步走向衰落。“在下一个世纪中,荷兰的海洋经济依然很强大,但再也不能重振雄风,回到1673年挑战英法联军的辉煌岁月了。”^[22]到18世纪初,荷兰已经丧失了海上优势和贸易的垄断地位,从一个商业大国下降为一个依附于英国的二等国家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英国取代了荷兰“海上霸主”的地位,为自己称霸海洋铺平了道路。英国能够战胜荷兰,主要因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具有雄厚的资本主义经济实力。荷兰是靠经营海上转运贸易发家的商业国,没有本国发达的工业作为贸易的基础,所以在自由竞争中终于敌不过工业资本发达的英国。对此,马克思指出:“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23]

进入工业资本时代,英国工业革命确立了其在未来必将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资本全球化运动的源头地位。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于英国,至19世纪3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陆续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数据显示,1918年前50年间,世界经济年增长2.1%,比19世纪上半叶年均增加一倍。按不变价格计算,1800~1900年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1.54%。^[24]经济的发展使西方在全球政治中日益居于优势地位,居于资本中心并控制较多世界贸易和资源的国家,就会在世界财富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而这些在世界财富增长中占据较多份额的恰恰就是拥有强大海军和广泛制海权的国家。“从近代西班牙、英国到现代美国崛起并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历史变动中,人们发现:与中世纪不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国家海权而非陆权的扩张是同步上升的。这是因为,海洋是地球体的‘血脉’,因而也是将国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将世界财富送返资本母国的最快捷的载体。于是,控制大海就成了控制世界财富的关键。”^[25]

19世纪马汉海权理论产生的基础,也恰恰在于对资本全球化时代国家盛衰过程中贸易与海权关系的分析。马汉认为,国家的强大、繁荣和商业贸易与国家制海权息息相关。美国要想成为强国,就必须抛弃“大陆主义”,在世界贸易方面采取更富于进取性和竞争性的政策。这就要求美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占领海上关键岛屿作为海军基地以保护美国在海外的商业利益。1889年3月,本杰明·特雷西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忠实地反映了马汉的观点,指出美国海军需要一支战斗力量。1890年美国国会终于放弃了大陆政策和孤立主义,开始摆脱旧的近海作战思想,建议发展可以用于深海作战的和现代化的海军。到19世纪末,美国的海军力量已由原来世界海军的第12位跃居第5位。^[26]1895年英国属地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强行干涉,英国被迫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击败西班牙,占领古巴和菲律宾;1903年又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由此一跃成为东太平洋上的海权强国。^[27]但是,必须看到美国海权发展的动机来自其日益扩展的海外利益,而其最深刻的动力则是其从其完成工业革命后日益增长的全球资本扩张能力。19世

[22] [英]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郑振清、向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23]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372页。

[24] 张跃发、刘养洁:《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1500~1900》,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25] 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26] 王连元:《美国海军争霸史》,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页。

[27] 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每年对外贸易顺差开始急剧上升。从1895年到1914年在美国海权崛起的过程中,美国的出口收入超过进口付款的累计数,已达100亿美元。同期美国制造业翻了一番,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上升了近5倍;1890年到1914年商业运输船舶从340万吨上升到700万吨,增加了2.06倍;1897~1914年间,美国在国外的投资增加了5倍。在海外市场及利润回流扩大与增长的同时,美国政府用于管理机构和社会福利的支出也大幅度增加。^[28]1914年,美国国民收入已达137亿美元,比同期英国的110亿美元高0.25倍,比同期法国的60亿美元高1.28倍,比同期德国的120亿美元高0.14倍。^[29]一战和二战后,欧洲英法霸权国家普遍衰落,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性海上强国,它在世界财富和资源分配中占据主要份额。

通过考察西方海权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西方海权发展的历史线路是:商业冒险与劫掠式殖民扩张(葡萄牙、西班牙)——商业资本扩张(荷兰)——工业资本扩张(英国、美国),殖民地、海军构成了其重要的支撑,但其最根本的历史动力及其支撑因素无疑是资本扩张的能力。

三、如何科学看待海权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在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中,海权论的集大成者马汉特别强调海权对于大国地位的重要性。他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关于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在其广阔的画卷中蕴涵着使得一个濒临于海洋或借助于海洋的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秘密和根据。^[30]但马汉的分析主要针对海权对某些国家的影响,尤其是结合英国分析了海权对于确定大国地位的重要性,没有上升到从国际体系角度进行分析的高度。

在后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对海权的分析逐步上升到国际体系分析的高度。美国学者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认为,16世纪以来,在为期约100年的每个长周期内都会出现一个海上霸权国,其存在对维持国际秩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他们将世界体系中的大国兴衰看作是“海权国”与“陆权国”之间的博弈。他们指出,在全球战争中,世界领导国率领的海洋联盟总是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大陆挑战者联盟。在他们看来,海军力量的大小是区别地区大国与世界大国的重要标尺。“海军占据优势,不仅能够确保海上交通线,还能够保持过去通过战争而确立的优势地位。要想拥有全球性的强国地位,海军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31]在过去的500年中,能够称得上世界大国的只有九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俄罗斯(苏联)、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至少曾经拥有世界战舰的10%。而其中,只有葡

[28] [美]H·N·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彭松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216、220、238、216、220、238、257、258页。

[29] 张跃发、刘养洁:《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1500~1900》,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30]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31]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949~1993*,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pp.3-26

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能成为世界霸权国。因为它们曾拥有的战舰队(同时代)世界大国战舰队总量的一半以上,或者其海军军费开支占世界海军开支的一半以上。^[32]而且这些海上霸权国都分别主导了各自时代的海军技术革新,如葡萄牙的多桅帆船、荷兰的麦卡托航海图、英国的战列舰、美国的海军航空学等。^[33]

在发现大国兴衰与海军的密切关系后,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进一步指出:世界霸权国不仅都是世界海军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它们同时也是世界经济领先产业的主导国。例如,1430~1494年世界领先产业是黄金贸易,1494~1540年世界领先产业是印度香料贸易,而葡萄牙在这两个产业中都居主导地位。也就是说,通常霸权国也是世界经济领先产业的主导者。^[34]由此可见:一个海权国家要成就世界霸权,不仅需要足够强大的海军,而且还必须是世界科技的创新国,必须主导世界经济的领先产业。^[35]

对于莫德尔斯基关于“世界大国”应该具备的条件,我国学者王逸舟将其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从中也能发现海军、制度创新和经济主导对于“世界大国”的重要性:^[36]第一,从地理环境看,世界大国必须是有“安全盈余”(surplus security)的岛国或半岛。比如,葡萄牙地处伊比利亚半岛前部,荷兰拥有许多小岛和海角,英国以多佛尔海峡为屏障,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岛国”,这些过去的和现在的世界大国都具备称霸条件。第二,要能维持海军力量等全球性政治和战略组织、集中拥有占世界整体一半以上的海军力量。这一点对于所有关注世界霸权问题的西方理论家是一致的。第三,必须是“主导经济”(leading economy)的国家。这不是指单纯的经济规模和富裕程度,而是指以经济创新能力为中心的综合经济实力。上述四国在各自的时代都开拓了经济及科技的新领域,这些新领域不仅帮助这些国家成为世纪霸主,而且逐渐外溢、成为各国争相仿效和开发的领域。第四,国内政治是开放的和稳定的,即便有偶尔的内乱或政局不稳等国内问题,也不足以削弱其对外领导作用。^[37]

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以全盛时期的英国为例,指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出现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首先,英国主导建立和控制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其主导世界经济关系的能力对于英国霸权至关重要。他指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强调一种开放和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它以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平等待遇为基础,而不是以控制和支配殖民地为基础。……在英国制海权的保护伞下,英国的贸易和投资拥有者进入世界市场、取得原料来源的相对自由的通道。”其次,“‘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第二个主导因素是英国海军的至高无上地位。由于同其他条件偶然交汇,英国海军可以对全球政治产生强大的和广泛的影响。英国的地理位置不与欧洲大陆海岸衔接,它所拥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军基地遍及世界各地,使它可以控制欧洲大陆同外部世界的通道,并拒绝承认其欧洲对手的海外殖民地。……英国拥有更进一步的优势使其能够以最小的代价保持全球的霸权和现状。由于特定的地理位

[32] Ibid., p.106.

[33] Ibid., p.25.

[34]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Leading Sectors and World Power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6, p.105.

[35] 曹云华、李昌新:《美国崛起中的海权因素初探》,《当代亚太》2006年第5期,第24页。

[36]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3-434页。

[37]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置,英国人能够以相对较少的舰只围困大陆;只是法国海军、更重要的是德国海军在 19 世纪后期的重新崛起,才威胁了英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欧洲大陆以外实际上没有敢于向英国挑战的国家,直至 19 世纪后期美国和日本成为重要的海军强国。随着这些挑战的海军强国的崛起,保持霸权对英国来说将成为沉重的负担。’第三,罗伯特·吉尔平同样看重经济、技术革命因素的重要性。“英国政府投资战略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运输方面和技术革命。陆地和海上的通讯和运输由于廉价钢铁的发明和海路运输中蒸汽机的运用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汽船减少了海运的实践、成本和风险,因而对经济关系以及军事力量的运用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使前所未有的全球规模的专业化和国际分工成为可能。”^[38]

对于拥有海权这一共性特征的世界霸权而言,其历史发展的逻辑是新兴的世界霸权往往具有更多的可支配性的资源,而制度创新能力则构成了霸权可支配性资源的核心要素之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 2002 年发表《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对过去 500 年的世界海洋霸权国家实力资源的演变进行了归纳,另有学者对主要海权国家崛起模式进行了概括(见表 1,表 2),都生动体现了体制和制度创新能力与海权强弱及其存续长短之间的关系。

表 1 主要国家及其实力资源(1500—2000 年)

时期	主要国家	资 源
16世纪	西班牙	黄金、殖民地、雇佣军、王朝纽带
17世纪	荷兰	贸易、资本市场、海军
18世纪	法国	人口、农业、公共管理、军队、文化(软实力)、工业、政治凝聚力、金融和信贷、
19世纪	英国	海军、自由准则(软实力)、岛屿位置(易于防守)经济规模、科技领先地位、地理位置、
20世纪	美国	军事力量和盟国、普及的文化和自由的国际机制(软实力)
21世纪	美国	技术领先地位、军事和经济规模、较实力、跨国通信的中心

资料来源:[美]约瑟夫·奈:《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载胡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7 页。

表 2 世界主要海权国家崛起的模式

国家	崛 起 模 式
西班牙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
荷兰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暴利的商业贸易
英国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暴利的商业贸易+工业革命
美国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海洋秩序)+殖民扩张+暴利的商业贸易+工业革命+技术创新+软实力

资料来源:根据辛向阳《霸权崛起与挑战国家范式分析》一文的内容整理而成,参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 年第 4 期。

[38]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6-137 页。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海权的分析,都强调了海权对于确立世界大国的重要性。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尽管强调了海权对于大国地位的重要性,但是多数学者都是结合其他因素(如经济、技术和制度的创新等)强调海权重要性的。因此,认识海权对大国崛起的影响,需要结合其他因素予以客观全面地认识,尤其不能离开具体的国际环境与国家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海权国家之所以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上扮演了霸权的角色,与近代以来海洋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纽带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海权并非是大国崛起的唯一条件,大国的崛起还与诸如国家领土、人口、文化、制度选择等多种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例如,就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而言,尽管马汉等人不断强调海权对于其霸权崛起的重要性,甚至将海权对于英国霸权崛起的影响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也有西方学者指出海权仅仅是其霸权崛起的因素之一,并且是与综合国力等其他因素一起发挥作用促成英国的崛起的(如莫德斯基、吉尔平的分析)。国内也有学者指出:“英国在20世纪以前的成功有赖于两大支柱:海上霸权和均势外交”,“没有雄厚的综合国力作基础,这两大支柱可以说一个都支撑不起来。”^[39]

世界海权兴衰交替的历史表明,海权本身并不具有确保国家强盛的神奇功效,国家盛衰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活力以及制度创新的能力。在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国海权的理论探讨中,部分学者对海权的认识存在着片面夸大的倾向,认为海权是历史上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指出“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强大的海军是国内财富积累和民主发展的保证”。^[40]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对于海权与国家崛起关系的认识,尤其要摆脱那种强调大国崛起离不开海权支撑,而忽视海权背后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的简单化思维。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列强炮舰面前遭受的屈辱一直激励着我们要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决心。但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发展军力是为达成国家的战略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海上强国梦”。^[41]

[39] 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15页。

[40] 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第86页。

[41] 唐世平:《塑造中国理想的安全环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